

中国对非洲境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相互影响研究^{*}

张延群

摘要: 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及中国对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资(ODI)快速增长,2003—2022 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5.4% 和 27.1%。一些文献对中国在非洲 ODI 的驱动因素,以及中非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对非洲国家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本文运用 2003—2021 年中国在非洲 ODI 存量最大的 20 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 ODI 的决定因素以及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对其他影响 ODI 的因素,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治理水平,以及是否与 ODI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和长期看,东道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对非洲 ODI 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社会治理水平高、与 ODI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国家能吸引到更多的 ODI,自然资源禀赋对 ODI 的影响不显著。中国 ODI 对部分东道国经济有长期或短期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还对未来中国对非洲 ODI 的走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境外直接投资 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 跨国投资

作者简介: 张延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

(一) 研究背景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启动之后,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及直接投资(ODI)在近 20 年出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在 2003—2022 年分别达到 15.4% 和 27.1% (存量)。中国在非洲的 ODI 存量从 2003 年的 4.9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末的 470 亿美元,目前中国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同时从 2008 年开始,中国连续 14 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① 中非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中国对非洲 ODI 的高速增长,投资的非洲国家和地区数量从 2003 年的 29 个发展到 2021 年的 52 个,覆盖率达到 86.7%;^② 2021 年中国在非洲设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基础学者资助项目“我国收入分配有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XJ20230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宏观大数据建模和预测研究”(项目编号: 71991475)的部分研究成果。

①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②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3400 家，占中国全部境外企业的 7.5%。^① 同时，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也更加多元化，2003 年之前，中国对非洲 ODI 的主体大多是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禀赋高的国家，聚焦在地质勘查与开发以及基础设施等行业。2003 年之后，私营和民营等非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对非洲的 ODI 中，投资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2009 年之后，中国对非洲的 ODI 逐渐从资源导向型转变为以市场导向型为主，投资领域从地质勘查与开发、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向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多领域拓展。2021 年末，中国对非洲 ODI 存量前五位的行业为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分别为 37.0%、22.6%、13.4%、9.5%、4.6%，合计达到 87.1%。^② 投资主体已经不再只被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所吸引，而是更多地参与到非洲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当中，同时 ODI 逐步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黎明等，2017）。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以及中非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皮尤调查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 年的一项调查，非洲受访者对中国有更加积极的评价（Chen 等，2018），但也出现一些负面言论（魏国学等，2010；刘爱兰等，2017；Zhang，2021），如错误地声称中国对非洲的 ODI 给非洲国家带来“资源诅咒”或者政治不稳定等负面影响（Kaplinsky，2008）。

中国对非洲不断上升的 ODI 规模以及对非洲经济社会的影响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一些研究探讨中国对非洲 ODI 的主要驱动因素，通常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国家治理环境、政治稳定性等。Chen 等（2018）使用商务部提供的在非洲投资企业数据库，发现中国的 ODI 与东道国的国家治理环境没有相关性，中国的中小企业很少在自然资源领域投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同时在技术富裕的国家更多地在技术密集型部门进行投资，在资本稀缺的国家更多地在资本密集型部门投资。这些特征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受到利润驱动，与其他国家在非洲投资的驱动因素没有不同。王永钦等（2014）以中国在全球范围的 ODI 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 ODI 不太关注政治制度和稳定性，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等。朱丽萌和韩雨（2023）使用近期的数据通过实证方法得到的结论是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市场与效率等是中国对非洲 ODI 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的影响越来越小。陈岩等（2012）认为东道国资源不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东道国和母国制度因素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

另有一类文献探讨了中国对非洲 ODI 对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所带来的影响。Obobisa 等（2021）应用 1999—2018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 ODI 促进了非洲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中高收入国家有负面影响。Miao 等（2021）运用 2003—2017 年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对非洲的 ODI 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治理水平。Zhang（2021）使用 2003—2018 年跨国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在非洲的 ODI 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了东道国的出口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魏国学等（2010）基于全球 135 个发展中国家 1995—2007 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中国是否引发了欠发达国家“资源诅咒”，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源进口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秦宇和李钢（2023）讨论了东道国发展阶段如何影响中国对非洲 ODI 的问题。

①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②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二）研究内容

根据对外投资理论，ODI 与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相互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稳定状况、政治清明状况等都会影响所吸引的 ODI，同时 ODI 也可能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产生影响。ODI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如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促进东道国吸收新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提高生产率等。同时有可能因为竞争效应、贸易效应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 ODI 的贸易效应给东道国国内制造业市场带来竞争压力，竞争效应在外部市场对东道国出口导向性的产业产生负面影响等。

现有文献对中国在非洲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 ODI 对东道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分别进行了分析，但目前还少有文献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同时对中国在非洲 ODI 投资额与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近 20 年来中国对非洲国家 ODI 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相互影响为研究主题，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 ODI 与东道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投资、消费、出口等的长期和短期关系。研究发现，在大多数东道国，中国 ODI 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长期均衡关系，且 ODI 主要受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所驱动，对部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在短期或长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东道国按照不同特征分为资源禀赋丰富或不丰富、社会治理水平较高或较低、经济增长与 ODI 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等不同的群组进行分析，发现总体和长期看，驱动 ODI 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控制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后，发现在 ODI 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国家，以及社会治理水平更高的国家吸引到更多的 ODI，但自然资源禀赋的高低对 ODI 投资额的影响不显著。这些实证分析的结论与跨国投资的理论是相符合的，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并没有一些国外学者所声称的具有特殊性。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对未来非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对中国在非洲 ODI 投资额未来走势进行了分析。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对非洲的 ODI 与东道国经济相互影响的典型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第三部分是中国对非洲的 ODI 与东道国经济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对中国对非洲 ODI 的未来走势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事实描述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虽然较小，但近 20 多年增长迅速，在非洲国家吸引的全部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由 2003 年的 1% 上升到 2021 年的 5%。^① 这一时期非洲经济总体上也经历了较快的增长。图 1 为非洲实际 GDP 增长率的走势，在 2003—2009 年经历了快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5% 左右，但是 2010 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特别是 2020 年受到新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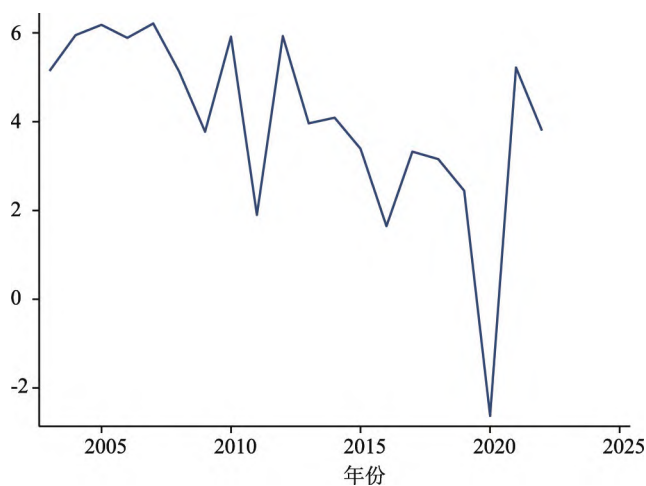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22 年非洲实际 GDP 增长率 (%)

数据来源：万得（Wind）数据库。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疫情影响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21—2022 年经济增长开始恢复，但增长率仍然明显低于 2003—2009 年的水平。图 2 为非洲以美元计价的 GDP 总额以及中国对非洲 ODI 流量的走势图（经过标准化处理），可以看出中国 ODI 流量的走势与非洲 GDP 走势是基本一致的。在 2003—2009 年，两者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走势；在 2010—2021 年，两者增长速度与前期相比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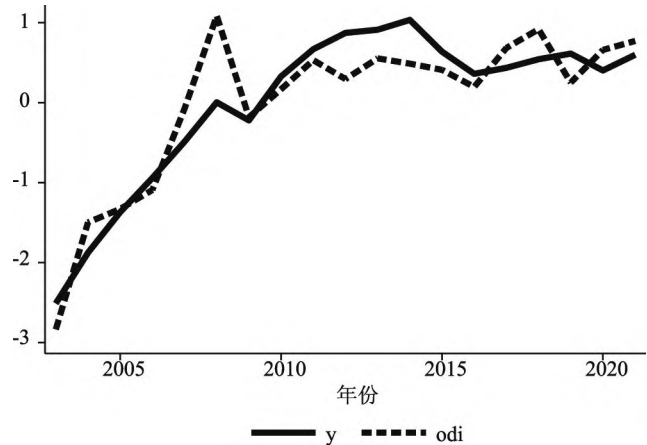


图 2 2003—2021 年非洲实际 GDP（取对数）（y）与中国对非洲 ODI 流量（取对数）（经过标准化处理）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中国对非洲 ODI 最多的前 20 个国家（以 2021 年底 ODI 存量为标准）按照 ODI 存量从大到小排列，分别为南非、刚果金、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尼日利亚、肯尼亚、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尼日尔、埃及、莫桑比克、苏丹、加纳、毛里求斯、刚果布、几内亚、科特迪瓦、乌干达，排名第 1 的南非和第 20 名的乌干达占中国对非洲全部 ODI 的比重分别为 12% 和 1.4%。近 20 年这 20 个国家吸引到的中国 ODI 存量占中国对非洲 ODI 总存量的 85% 左右，2021 年为 87.4%；近 20 年这 20 个国家 GDP 总额占非洲所有国家 GDP 的 80% 左右，2021 年为 80.3%。因此，无论从 ODI 存量还是 GDP 规模看，这 20 个国家对于分析 O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首先使用这 20 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对每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与吸引到的中国 ODI 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东道国的其他特征如社会治理能力、自然资源禀赋、是否与 ODI 有长期均衡关系等对 ODI 的影响进行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对 20 个国家分别进行分析

考虑到以上提到的 20 个非洲国家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人均 GDP 水平、社会制度、政治稳定性、资源禀赋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本文首先构建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VECM），对这 20 个国家进行单独分析，对 ODI 与东道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如 GDP、投资、消费、出口等相互影响进行分析。从图 2 看出中国对非洲 ODI 流量的走势与非洲 GDP 的走势基本相似，如果对这 20 个国家的 GDP 与 ODI 流量分别做图，在其中多数国家也发现了相似的走势，提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是中国 ODI 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找到一定的共同性后，再对国家进行分组，在面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实证分析所使用的主要变量是实际对外投资总额（odi）、实际 GDP（y）、实际资本形成（inv）、实际总消费（cons）、实际出口（exp）。以美元为单位的变量名义值数据来源为 Wind 和 CEIC 数据库，用美国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值。所使用变量的详细定义以及统计描述如表 1 所示，样本期为 2003—2021 年。

根据变量的单位根检验，除了 1 个国家（尼日尔）的 ODI 流量为不含单位根的稳定变量，其 ODI

存量是 I (1) 变量, 在其他 19 个国家名义和实际 ODI 流量以及名义和实际宏观经济变量如 GDP 等都是含有一个单位根的非平稳变量, 因此在这 19 个国家使用 ODI 的流量数据, 尼日尔使用 ODI 的存量数据。在一些国家的个别年份出现了名义 ODI 流量为负数的情况 (出现负数的主要原因是当期利润再投资为负数时记入当期 ODI 的负流量值), 为了能够统一取对数, 当出现负数值时, 将这一年的 ODI 流量值设定为 100 万美元, 同时将相邻的前一年或者后一年的 ODI 值减去这一年 ODI 的绝对值以及 100 万美元, 这样处理后保证 ODI 流量的整体水平保持不变。

表 1 2003 年和 2021 年非洲 20 个国家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单位: 百万美元

| 变量 | 定义 | 平均值 | | 最小值 | | 最大值 | | 标准差 | |
|------|----------------|--------|--------|--------|--------|--------|--------|--------|--------|
| | | 2003 年 | 2021 年 | 2003 年 | 2021 年 | 2003 年 | 2021 年 | 2003 年 | 2021 年 |
| odi | 实际直接投资额流量, 取对数 | 0.20 | 4.16 | -3.51 | -0.37 | 3.20 | 6.58 | 1.80 | 1.96 |
| y | 实际 GDP, 取对数 | 14.11 | 15.17 | 12.73 | 13.58 | 16.80 | 17.23 | 1.20 | 1.16 |
| invt | 实际资本形成, 取对数 | 12.51 | 13.99 | 10.73 | 11.69 | 14.94 | 16.52 | 1.33 | 1.31 |
| cons | 实际消费, 取对数 | 13.89 | 15.28 | 11.91 | 13.67 | 16.56 | 17.48 | 1.22 | 1.17 |
| exp | 实际出口, 取对数 | 12.43 | 13.81 | 10.47 | 11.70 | 15.11 | 16.33 | 1.35 | 1.20 |

数据来源: Wind 和 CEIC 数据库。

实证分析的第一步是对以上提到的 20 个非洲国家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并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M) 的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VECM 模型的设定为方程 (1):

$$\Delta X_t = \alpha \beta' X_{t-1} + \Gamma_1 \Delta X_{t-1} + \Phi D_t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 X_t 是模型中所有变量构成的向量, D_t 是截距项以及哑变量。 $\varepsilon_t \sim iidN(0, \Omega)$ 是误差项, α 和 β 是 $p \times r$ 维系数矩阵, r 是系统中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个数。 β 中的系数表示协整关系, α 中的系数表示向协整关系调整的速度和方向 (Juselius, 2006)。

基于模型 (1), 可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以及短期变量是否向着均衡关系调整。还可以通过 α 系数在不同方程中的显著性, 判断变量是否为弱外生变量, 即当协整关系出现均衡的偏离时, 弱外生变量不做调整, 可以看作是系统的驱动力量, 也可判断变量是否为对长期趋势不产生影响的完全调整变量 (Juselius 等, 2014)。

由于数据时间样本较小, 本文采用尽量从简约模型开始的策略, 即建立 4 个分别只包含 2 个变量的 VAR 模型, 即模型 1 包含 y 和 odi, 模型 2 包含 invt 和 odi, 模型 3 包含 cons 和 odi, 模型 4 包含 exp 和 odi, 分别对模型 1、2、3、4 进行协整以及短期调整关系的分析。简约的设定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 因为在 VECM 的模型框架下, 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这一协整关系在模型加入新的变量之后仍然成立 (Juselius, 2006)。

在模型 1、2、3、4 中, 将 y, invt, cons, exp 方程中的短期调整系数记为 α_1 , 将 odi 方程的短期调整系数记为 α_2 , 检验结果可以分为以下 4 种情形。情形 1: 存在协整关系, 且 α_1 显著, α_2 不显著, 可解释为 odi 是弱外生变量, 对宏观经济变量有长期影响且起到驱动作用; 情形 2: 存在协整关系, 且 α_1 和 α_2 都显著, 可解释为 odi 对宏观经济变量有长期影响, 但不是驱动力量; 情形 3: 存在协整关系, 且 α_1 不显著, α_2 显著, 可解释为 odi 是完全调整变量, 是完全受宏观经济变量驱动的; 情形 4: 不存在协整关系, 可解释为 odi 与宏观经济变量没有长期均衡关系 (Juselius, 2006; Juselius 等, 2014; 张延群, 2023)。

单位根检验显示：除了 1 个国家（尼日尔）的 odi 流量为 $I(0)$ 变量， y ， $invt$ ， $cons$ ， exp ， odi 流量均为含有一个单位根的 $I(1)$ 变量。根据数据和误差情况适当加入哑变量，以消除个别年份数据的跳跃或者过大的误差项所产生的影响。所有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1，误差项通过了自相关性、正态性、异方差性的模型设定检验。^①

表 2 为基于模型（1）的估计结果。在 20 个国家中， odi 与 y ， $invt$ ， $cons$ ， exp 存在协整关系的分别为 14、12、13、12 个（情形 1+2+3）。在 y ， $invt$ ， $cons$ ， exp 模型中出现情形 1 的结果分别有 1、2、2、1 个；出现情形 2 的结果分别为 4、2、2、4 个；出现情形 3 的结果分别为 9、8、9、7 个，属于占比最多的情形；出现情形 4 的结果分别为 6、7、6、7 个。

从模型 1 的结果看，在 20 个国家中的 14 个国家， odi 与 y ， $invt$ ， $cons$ 或者 exp 有协整关系（情形 1+2+3）。在 14 个国家中有 1 个国家（安哥拉） odi 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影响（情形 1）；有 4 个国家（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乌干达）的 odi 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短期正向的影响（情形 2）；9 个国家（刚果金、肯尼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埃及、加纳、毛里求斯、刚果布、几内亚）的 odi 对东道国既没有长期也没有短期的影响，是完全由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情形 3）；6 个国家（南非、阿尔及利亚、尼日尔、莫桑比克、苏丹、科特迪瓦）的 O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没有长期关系（情形 4）。总体上看，大多数 odi 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长期和短期的制约，是由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表 2 20 个国家 VECM 模型的估计结果

| | 模型 1 y, odi | 模型 2 $invt, odi$ | 模型 3 $cons, odi$ | 模型 4 exp, odi |
|--|------------------|---------------------|---------------------|--------------------|
| 情形 1: 有协整关系, α_1 显著, α_2 不显著 | 1 | 2 | 2 | 1 |
| 情形 2: 有协整关系, α_1 显著, α_2 显著 | 4 | 2 | 2 | 4 |
| 情形 3: 有协整关系, α_1 不显著, α_2 显著 | 9 | 8 | 9 | 7 |
| 情形 4: 没有协整关系 | 6 | 7 | 6 | 7 |

注：单元格中的数值是指属于不同情形的国家个数，其中尼日尔缺失 $invt$ ， $cons$ 和 exp 的数据，因此模型 2、3、4 的情形总数为 19。 α_1 为 y ， $invt$ ， $cons$ ， exp 方程中的短期调整系数， α_2 为 odi 方程中的短期调整系数。估计和检验运用 Cats in Rats version 2（Dennis 等，2006）软件完成。

（二）将 20 个国家作为总体进行分析

以上 VECM 模型结果显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 ODI 的主要决定因素。为了进一步检验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治理水平、与 ODI 有无长期均衡关系等是否为 ODI 的影响因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中进一步用 20 个国家 2003—2021 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2）进行分析，在面板模型中加入刻画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 $rent$ ，参考现有文献将 $rent$ 定义为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比重， $rent$ 值越高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定义哑变量 $dum01$ ，将 $rent$ 大于 11（2003 年 20 个国家 50% 分位数水平）的国家的 $dum01$ 设定为 1，其余国家的 $dum01$ 设定为 0。 $dum01$ 等于 1 的国家分别为刚果金、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加纳、刚果布、几内亚、乌干达。在模型（2）中加入世界银行发布的刻画各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

^①详细的检验结果可向作者索要。

变量 WGI。WGI 由 6 个维度的指数来刻画，分别为话语权与问责权、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等，在每一个维度的指标中都包含得分，以及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所处的分位数水平，分位数水平越高表示治理水平越好。本文选择用政治稳定和无暴力这一维度中的分位数水平值（pvr）来刻画各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将 2003 年 pvr 大于 40% 分位数国家的 dum02 设定为 1，其余国家设定为 0，dum02 等于 1（即社会治理水平较好）的国家为赞比亚、尼日尔、莫桑比克、加纳、毛里求斯。定义哑变量 dum03，将在 VECM 模型中发现 y ， inv ， $cons$ 或者 exp 与 odi 有协整关系的 14 个国家的 dum03 设定为 1，其他 6 个国家设定为 0。dum03 等于 0 的 6 个国家分别为南非、阿尔及利亚、尼日尔、莫桑比克、苏丹、科特迪瓦。

面板模型（2）的设定为：

$$odi_{it} = \beta_0 + \beta_1 y_{it} + \beta_2 dum01 + \beta_3 dum02 + \beta_4 dum03 + \varepsilon_{it} \quad (2)$$

对模型（2）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方法进行估计，表 3 为估计结果。 β_1 显著为正，而且系数接近 1，说明从总体和长期看， odi 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弹性基本等于 1。 $dum01$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长期和从总体上看，自然资源禀赋对 ODI 流量的影响不显著，如果将 $dum01$ 替换为 $rent$ 的对数，结果也基本相同。 $dum02$ 和 $dum03$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从长期看，在社会治理水平较高的国家，以及 odi 与 y 有长期关系的国家整体上有较高的 ODI 流量。运用 Fisher 方法（Maddala 和 Wu，1999）对表 3 中方程（d）的误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误差项是不含单位根的平稳过程，也就是说，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模型（d）中的估计系数可以解释为是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表 3 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及误差单位根检验

| (1) 模型 (2) 的估计结果 | | | | |
|--|--------------------|--------------------|--------------------|--------------------|
| 解释变量 | (a) <i>odi</i> | (b) <i>odi</i> | (c) <i>odi</i> | (d) <i>odi</i> |
| y | 1.020** (0.129) | 1.027** (0.127) | 1.042** (0.129) | 1.060** (0.126) |
| <i>dum01</i> | 0.278 (0.357) | | | 0.138 (0.367) |
| <i>dum02</i> | | 0.880** (0.379) | | 1.195** (0.387) |
| <i>dum03</i> | | | 0.675* (0.391) | 0.957* (0.418) |
| 样本数 | 371 | 371 | 371 | 371 |
| 截面数 | 20 | 20 | 20 | 20 |
| (2) 方程 (d) 误差项单位根检验 | | | | |
| Fisher (lag = 2) ; $\chi^2 (40) = 71.65$; P 值 = 0.002 | | | | |

注：第（1）部分中估计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第（2）部分中的数值为检验值，p 值为含单位根的概率值。*、** 分别表示在 5% 和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四、中国对非洲 ODI 趋势分析

中国与非洲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非洲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年轻的人口结构，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处于较低水平，对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服务业也有较大的需求。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国在非洲还存在着大量的投资机会，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还有广阔的空间。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延伸，非洲是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打造中非经贸合作的升级版是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内容。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实施对非十大合作计划，通过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帮助非洲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预计中国对非洲的 ODI 将进一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

根据 2023 年 4 月 IMF 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经济预测，在假设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恢复，通货膨胀得到进一步控制，原油价格继续下降的前提下，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从 2021 和 2022 年的 4.1% 和 3.6%，继续下降为 2023 年的 3.1%；但是在 2024 和 2025 年经济增长率将开始回升，预计分别为 3.7% 和 3.9%，也即从 2024 年开始将缓慢回升。鉴于目前非洲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与 2009 年之前相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未来 5 年经济增长虽然有所回升，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中国对非洲的 ODI 大概率将保持平稳增长，但增长速度会较 2003—2009 年有所下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对中国在非洲国家 ODI 与东道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总体和长期看，中国对非洲的 ODI 投资额受到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部分国家 ODI 对东道国的经济有长期或短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会对 ODI 投资额产生长期影响；东道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对 ODI 有长期正向的影响，在具有较好社会治理水平的国家有较高的 ODI 投资额；在 O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有长期关系的国家有较高的 ODI 投资额。这些发现都符合跨国投资理论，与其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国投资是类似的，即市场规模、政治稳定是重要的因素，并不存在早期文献中所提出的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吸引中国对非洲 ODI 主要因素的结论。总体和长期看，中国 ODI 没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未来五年中国对非洲国家的 ODI 将受到非洲经济增长放缓的制约，大概率呈现平稳增长，增长速度将较 2003—2009 年有所下降。

鉴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对非洲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前景、政治稳定性和社会治理水平等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特别在目前世界经济出现逆全球化趋势，非洲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的大背景下，深入分析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对于企业减少和控制投资风险尤为重要。第二，随着中国在非洲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更加多元化，如投资领域从过去比较单一的地质勘探开发和基础设施产业向农业、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拓展，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将遇到新的深层次的困难和挑战。目前还比较缺少理解和熟悉非洲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结构的高级人才，国家应制定相应政策，加强有关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以帮助企业应对深层次的挑战。第三，对未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增速的变化应有所预判。过去 20 多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经历了高速增长，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债务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2022 年非洲接受的 ODI 流量以及中国对非洲的 ODI 流量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全球、中国和非洲经济增速大概率放缓的预期

下, 中国对非洲 ODI 的增速与前期相比有可能出现较明显的下降, 未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将从初期在较低基数上的高速增长向着全面巩固和深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增长速度有可能放缓, 对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有所预判。

参考文献:

1. 黎明、夏昕鸣、朱晟君、贺灿飞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 2017 年第 11 期。
2. 魏国学、陶然、陆曦 《资源诅咒与中国元素: 源自 135 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世界经济》, 2010 年第 12 期。
3. 刘爱兰、王智烜、黄梅波 《资源掠夺还是多因素驱动? ——非正规经济视角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4.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12 期。
5. 朱丽萌、韩雨 《“资源掠夺” 还是市场与效率驱动?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动因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3 期。
6. 陈岩、马利灵、钟昌标 《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 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 2012 年第 10 期。
7. 秦宇、李钢 《东道国发展阶段与中国对非投资策略》, 《齐鲁学刊》, 2023 年第 4 期。
8. 张延群 《财政支持对脱贫县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河南省原国家级贫困县为例》,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 年第 3 期。
9. 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秘书处主编 《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 (2023)》, 2023 年 7 月。
10. Chen, W. J., Dollar, D. and Tang, H. W., Why Is China Investing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Firm Level,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32, No. 3, 2018.
11. Zhang K. H., How does South – South FDI affect host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 – Africa in 2003 – 2018,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75, 2021.
12. Kaplinsky, R., What Does the Rise of China Do for Industrialisation in Sub – Saharan Africa? ,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115, 2008.
13. Obobisa, E. S., Chen, H., Ayamba, E. C., and Mensah, C. 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 Africa Trade, China OFDI, and Economic Growth of African Countries, SAGE Open, Vol. 11, No. 4, 2021.
14. Miao, M., Dinkneh, G. B., Jiang, Y., and Tigist, A. D., The impacts of Chinese FDI on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or Africa, Cogent Business & Management, Vol. 8, No. 1, 2021.
15. Juselius, K., The Cointegrated VAR Model: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Juselius, K., Møller, N. F., and Tarp, F., The Long – Run Impact of Foreign Aid in 36 African Countries: Insights from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Analysi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6, No. 2, 2014.
17. Dennis, J. G., Hansen H. and Juselius K., CATS in RATS,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version 2, Estima, 2006.
18. Maddala, G. S., and Wu, 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 Root Tests with Panel Data and a New Simple Tes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1, Issue S1, 1999.
19.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 – Saharan Africa: the big funding squeeze, April 2023.

责任编辑: 郭 霞

(5)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and the economy of the host country

Zhang Yanqun

In the past 20 years,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with Africa and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Africa have grown rapidly, with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s of 15.4% and 27.1% respectively from 2003 to 2022. Some literature has studie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ODI in Africa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on African countries, and has reached different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20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stock of ODI in Africa from 2003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determinants of ODI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analyzes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ODI, such as the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whether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with the O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overall and long-term,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i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of China's ODI in Africa, while countries with high social governance level and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with ODI attract more ODI, and the impact of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on ODI is not significant. China's ODI has a long-term or short-term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conomy of some host countries.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future trend of China's ODI in Africa.

(6) The trend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reform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Chen Yan, Liu Meng

At present,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China, as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producer and consumer, adheres to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own advantages, actively expand the spa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good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n the field of new energy development and respons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joint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make China's voice and contribute China's strength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deepen the existing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strengthen "the Belt and Road" energy partnership, and actively expand the energ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he EU.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oil and gas reserves and release,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governance mechanism led by China when the time is ripe.

(7) Research on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uo Xia

As one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new energy vehicles have a strong industrial chain driving effect, and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are competing to introduce policies to attract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in order to w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ew track". This article uses detailed data to analyze the main trends of global cross-border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new energy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y country's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oreign car compani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finally gives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level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 focus of policy is as follows: first, it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second, it should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predictability of policies and ensure the early participation of foreign-funded car companies; third, it should speed up the formulation of security rules for cross-border data transmission, so that China's automotive intelligent interconnection is synchronized with the world; fourth, it should vigorously encourag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eign-funded R&D and design centers, and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innovation ecological network; fifth, it should closely focus on the "three vertical" and "three horizont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s, and lay out strong chain and forward-looking investment.

(8) Innovative design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ng Xiaohong, Xie Lanlan

Design service is the source of industrial chain, innovation chain and value chain,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art, service forma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acting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industry,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ve design has become a key link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services and industries, and has overal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a manufacturing power, a quality power, and a digital China,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 series of major paradigm changes have emerged in design activitie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methods, service models, innovation subjects, and resource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showing important tren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pen source innovation, digitalization, platformization, green and low-carbon, service design, and ageing.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eading role of design in innovation, and many countries regard innovative desig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ake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novative design as the policy focu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design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iscal and tax policy support,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9) Research on precise and targeted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in China

Li Yongling, Liu Xuemin, Cong Jianhui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are highly overlapping with the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and the areas with high incid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and face the "double constraints" of ecological fragility and poverty, which are the key areas of poverty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stage of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To prevent and resolve multiple potential risks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and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implement precise policies and make targeted effort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this article divides poverty relief areas into three types: "ecologically fragile", "ecological damage"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identifies the main causes of poverty and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diffe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and combining China's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s, practical processes and typical cases, three major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concepts based on the impact of global